

三种影像

“在汾阳那些即将拆去的老房子中聆听变质的歌声，我们突然相信自己会在视听方面有所作为。”于是，27岁的汾阳后生贾樟柯拍出了电影《小武》（见左图，剧照）：以小县城为背景，扒手为主角，讲述了一个县城青年先后经历友情、爱情、亲情的沦丧，最终承担一个人孤独而高贵的坍塌。

法国电影杂志《电影手册》谈到贾樟柯的继承人时，将这个名头给了来自贵州的小镇青年毕赣。毕赣不同于贾樟柯的小说意识，他用诗歌书写亚热带气候浸润下的潮湿、氤氲、水雾、幽绿的西南县城。

在《路边野餐》（见中图，剧照）里，毕赣“搬进鸟的眼睛”，俯瞰一个县城诊所里的医生，也是诗人，踏上火车寻找侄子，来到一个亦真亦幻、超现实主义的城镇荡麦。荡麦就是毕赣“命运布光的手”，这双“手”书写了一个县城潮湿、失落的梦。

近日热播的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展现的是另一番风景：云朵、松林、草原、沙漠、湖水、牛羊和曦光，这是专属于牧民的、草原的县城。改编自李娟



的同名散文集，也赋予了这部剧集强烈的散文气质。

这三种县城影像的创作者，其共同特征就是以县城为创作的根据地，以文学意识和人文思想来思索人所生存的空间、时代的情绪及某种缥缈的不可捉摸的命运，最终成就三类风格迥异的佳作。

悬疑和爱情

像毕赣对诗歌的钟情，最近播完的电视剧《微暗之火》（见右图，剧照），也喜欢让诗歌参与叙事，意图制造一种残忍的浪漫。

清水镇，自然景观秀丽脱俗，而人文景观则被主创设置成一个世纪交替时期，潮湿、躁动、阴郁的县城。这是一个熟人社会，家家户户的私隐，总能轻

易地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这类环境有一种很强的控制感和压抑感。与之格格不入者，很容易成为毁损的靶子，比如冷艳、孤高与独立的美。童瑶饰演的南雅，便是一个这样的角色。美，成了她的原罪，招来祸事，但她却从不屈服。张新成饰演的周洛作为学霸，得了小镇的仰慕。因为无端退学，他又被推上风暴的中心。

两个绝望的人，因为一桩“杀夫案”联系在一起。所有的罪恶与救赎，皆因这个深渊般的清水镇。《微暗之火》以悬疑和爱情两大类型，呼应了“县城文学”摄影风潮所偏爱的元素：一是千禧年前后的怀旧式场景；二是在一个封闭环境中，关于人生下坠与自我救赎的。

在悬疑领域，县城叙事几

乎能够单独开辟一个亚类型。去年上映的改编自余华小说、由朱一龙主演的电影《河边的错误》，讲的就是一个相对闭塞的江南县镇，一条河边发生六次死亡事件，破案的警员面对命运的嘲弄和理性的崩溃，陷入谵妄与虚妄；评价颇高的《漫长的季节》，也是发生在一座小城桦林：以一座摇摇欲坠的钢厂社区展开，彼此相熟的人际关系，相对封闭的地域中，人心人性的涌动与较量，成了暴力与犯罪的一行脚注。

一体两面

事实上，迷雾剧场的《无证之罪》《隐秘的角落》等，我们很难想象这些故事发生在大城市抑或纯粹的乡村，反倒是滞后于时代的苦闷与瘀滞的县城景

观，才适宜培植悬疑的土壤。逼仄的环境、保守的道德、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固然使得县城屡屡成为犯罪的舞台，但它的另一面，那种基于熟人社会而产生的“命运相连的感觉或情感的共鸣”，那种相对于大城市更加日常、细碎的生活性，也使得县城更容易地，成为寻找情感慰藉者的爱情温床。

《春色寄情人》便是一部关于县城之美的爱情剧。故事聚焦到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南坪镇。小镇仿佛桃源，当然，它还是有一些“县城特色”：邻里相熟，观念陈旧。在两人的爱情故事中，时时跳动着关于“离开与留下”“小镇与上海”的话题。两个成年人的爱情，最终还是听从本性，在一个亲情稳固的地方——故乡，互相治愈。

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与之相似。许红豆仿佛另一版庄洁，因为大城市的疲惫，她落脚云南，跨入新生。

县城之美就像是恶的反面：有人心莫测，就有民风淳朴；有残垣断壁，就有山水田园；有暴力涌动，就有美好的爱发生。一体两面，方为县城。

（摘自5月19日《成都商报》李瑞峰文）

纪录片《再会长江》温暖中国



▲2011年，茨姆与竹内亮在纳帕海合影
▶十年后的茨姆



竹内亮写的一封信中提到，想在家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店。

十年后，竹内亮再次来到香格里拉，他凭着模糊的记忆寻访茨姆，找到了一间名为“aurora”的酒店民宿，这正是茨姆开的，而茨姆不再是当年那个腼腆姑娘，她从容自信地面对镜头，说“aurora”是她当年在黄浦江旁一座大厦看到的英文名字。

普通人故事衔接中国腾飞

如今茨姆的民宿格外热闹，虽然她自己后来又去了北京、南京，甚至还出国去了日本，但她印象最深的仍是17岁那年竹内亮带她去上海，茨姆说，“那是一道光，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”。

在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重庆，竹内亮遇到了新朋友——71岁的“棒棒”蒋师傅，用一根担子养大了家里的四个孩子，随着江边物流基地的兴起和发达，“棒棒”们也将慢慢退出市场。

面对家乡，面对工作，长江上的人们有自己由衷的热爱。竹内亮团队的摄影师以为茨姆去过上海后会不想回香格里拉，然而茨姆的回答是“怎么会呢？我更爱自己的家乡了”。

《再会长江》之所以感动这么多网友，是因为十年巨变中，以茨姆等人为代表的长江百姓，用普通人的故事衔接起中国社会十年间的发展腾飞，呈现出了一个极具人文情怀的温暖中国，同时也让世界见证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可信的全景中国。

（摘自5月23日《扬子晚报》孔小平文）

20世纪50年代初的刘青山、张子善案件，有“共和国反腐第一案”之称，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处理。公审大会前，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不枪毙，给他们一个改过机会。毛泽东说：

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、功劳大、影响大，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。只有处决他们，才可能挽救20个、200个、2000个、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。

“四个服从”是“四项最重要的纪律”

早在1929年，毛泽东就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：“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。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，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。”毛泽东可谓是这句话的第一践行者。

毛泽东早年曾受过三次大的“处分”。第一次是在1927年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毛泽东被认为“完全违背中央策略”、犯了“军事投机”的错误，受到“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”的“处分”。第二次是在1929年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，毛泽东被批评有“个人英雄主义和的家长式领导作风”“故应予以严重警告处分”，在随后的大会选举中，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职务。第三次是在1932年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，毛泽东因为“消极怠工”（不同意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）、“守株待兔”（主

张“诱敌深入”的反“围剿”方针）等受到“处分”。

历史证明这三次对毛泽东的“处分”都是错误的。毛泽东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放弃自己正确主张的同时，顾全大局，遵守党的纪律。据李维汉回忆：

他坚持三条：一是少数服从多数；二是不消极；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。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，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，还批得很厉害。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，仍能维护党的统一，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。

针对党内存在的破坏纪律行为，毛泽东反复强调“四个服从”，以实现党的统一。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报告时指出：“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，必须重申：（一）个人服从组织；（二）少数服从多数；（三）下级服从上级；（四）全党服从中央。谁破坏了这些纪律，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。”

1942年，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，毛泽东针对闹独立性问题再次强调“四个服从”。他说，一部分同志“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，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，尤其要集中。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服从上级，局部服从全体，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。张国焘是向党闹独立性的，结果闹到叛党，做特务去了。”

（摘自《红岩春秋》2024年第5期）

外交部发言人点赞推荐

近日，纪录电影《再会长江》在全国影院上映，该片以长江为线索，拍摄团队从上海出发，一路溯流而上，途经南京、武汉、重庆等城市，跨越6300公里，用镜头记录下长江沿岸地区的变化。

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，该片以精湛的拍摄反映出十年来长江沿岸地区的巨大变化，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。导演和主人公用真诚和善良，跨越时间、空间、语言和民族，带给观众共通的感动，希望各国朋友通过影片认识中国，亲身到中国走走看看，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脉搏。

在中国网络平台上，纪录短片集《再会长江》早在2022年就播出了，共9集，豆瓣评分高达9.3分。此次上映的是经过重新剪辑的《再会长江》电影版。影片4月时先在日本上映，大受好评，创下了日本文艺片票房排行榜第一名的出色成绩。

独特魅力在于故人重遇

2011年，中国纪录片《长江天地大纪行》在日本播出，让日

本导演竹内亮的名字被中日观众所熟悉。竹内亮从小就喜欢《三国演义》，那里面有很多长江的故事。日本没有这么大的河，所以他一直很好奇，很想亲眼去看看长江的源头。

事实上，这些年，关于长江的纪录作品有很多，而且精品迭出，《再会长江》能够脱颖而出，其独特的魅力在于跟2011年纪录片《长江天地大纪行》产生了连接，不仅有故地重游，还有故人重遇。从《再会长江》的镜头里可以看到，十年来，无论是山川美景，还是长江沿岸人们的生活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这“变化”中，名叫仁青茨姆的藏族姑娘的故事尤为感人。

影片呈现了竹内亮2011年拍摄《长江天地大纪行》时第一次见到茨姆的画面，镜头穿过香格里拉纳帕海景区的一个小门，门后怀里抱着小羊羔的藏族女孩，便是17岁的茨姆。她抱小羊与游客合照，一张照片收费5元，因性格内向，很难招揽到生意。

面对镜头，茨姆满脸好奇。节目组邀请他们一家去上海旅游，那是茨姆第一次见到香格里拉之外的世界。回去后茨姆给